

“善恶皆是”还是“善恶皆非”

——《双城记》中德法奇太太的双重身份

董梅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双城记》是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巨著,小说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德法奇太太就是其中一位。德法奇太太虽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在整篇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文学评论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此部小说进行过大量研究,对其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无意在德法奇太太是善是恶上做出绝对性判断,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分析德法奇太太的性格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逐渐由善变恶以及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她双重身份的形成。

关键词:善恶;双重身份;德法奇太太;《双城记》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4-0145-04

1 引言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双城记》是狄更斯一部知名度极高的小说,国内外学者对此部小说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狄更斯对于革命的态度以及其对善的颂扬和对恶的抨击。关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技巧的研究非常多,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探讨也不少。其中,分析德法奇太太人物形象的评论不在少数,但是大部分关于德法奇太太形象的评论集中在她在复仇行动中残酷恶毒的一面,对德法奇太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双重身份很少提及。本文试图阐明随着故事的展开德法奇太太一反她有同情心、勇敢正义的形象变得恶毒残暴的深层原因,以此来试图揭示德法奇太太由善变恶的内在原因。

在小说《双城记》中,德法奇太太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女人,她的双重身份可以在以下几个转变中得以体现。第一,一开始,德法奇太太同情受压迫者并领导他们对抗贵族阶级,从这一层面讲,她是一个勇敢的女英雄。然而,由于德法奇太太对贵族阶级不可消除的仇恨,她变为了一个恶毒的复仇者。第二,在小说的一开始,德法奇太太是一个受迫害者,但是当革命爆发,她的角色即由一个受压迫者转变为一个冷血的压迫者。第三,德法奇太太是埃弗雷蒙侯爵兄弟罪恶的受害者。她

扭曲的人格即是由于她不幸的童年及悲惨的生活经历造成的。当暴乱发生,德法奇太太即由一个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加害人。因此,德法奇太太互相冲突的双重身份是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的直接结果。

2 德法奇太太作为女英雄和复仇者

约翰·杜威在《人性与行为》一书中认为:“人性存在且活动于环境之中,是在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具有‘可变性’和‘可塑性’。”人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受到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的限定。因此,杜威界定的人性的定义是:“……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机构和文化传统不断地把生物原料塑造成一定的人的模样。”他认为,“一切善与恶都是与客观力量结合而成的习惯。它们是个人的特性中的某些要素与外部世界提供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杜威排斥将人视为身、心二元对立的组合体,而人性也不是非善即恶的绝对先天性,而是随环境、习惯、心智等因素相互活动的历程,由经验不断的累积而成。高广孚在《杜威教育思想》一书中指出,“如果将人性固定化,无异在变化的‘实在’(reality)中,寻觅一成不变的‘确然’(certainty),这是不可能的。”^[2]杜威认为:“人性存在且活动于环境之中,所谓‘于其中’者,非如银钱之置于盒中,而若物之生长于土壤日光中。”^[1]换言之,人性是在环境之演变过程中,逐渐被塑造而成。因此杜威反对传统的性善或性恶论,肯定人

性的可变性(alterability)和可塑性(malleability)。

德法奇太太作为女英雄和复仇者的双重身份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动荡的社会环境所致。她人性中作为勇敢女英雄的“善”与作为残暴复仇者的“恶”都是当时动荡客观环境的结果。德法奇太太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性人物,她首先被描述为一个勇敢的女英雄,随后被描述为一个恶毒的复仇者。她本性中善与恶的两面性正体现出“人性是在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具有‘可变性’和‘可塑性’”的论断。

在小说的前几章里,我们看到她总是安静地坐在她和丈夫经营的酒铺里编织衣物。然而,她这种假装的被动掩盖了她对复仇不间断的欲望。当革命爆发,她由一个勇敢的女英雄转变为了一个恶毒的复仇者。德法奇太太成长在动荡不安的革命时期,遭受惨痛的个人悲剧,童年的创伤对德法奇太太的个性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社会危机四伏,阶级矛盾重重。贵族阶级蛮横无理,残酷剥削、欺压百姓,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贵族阶级的通知地位摇摇欲坠。德法奇太太正是这一动荡时期的受害者之一。一方面,作为一名贵族阶级残暴统治洗的受害者,德法奇太太遭受了巨大的不幸,她对残酷杀害她家人的贵族阶级怀有着极深的仇恨。在这种长期的仇恨在动荡的环境中滋长为一股反叛的力量,促使德法奇太太在动乱时期敢于领导群众起义攻打巴士底狱,推翻统治阶级。在这一层面上,德法奇太太是个勇敢的女英雄。法国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和德法奇太太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德法奇太太成为率领法国大革命的女英雄。另一方面,埃德蒙兄弟对德法奇太太家人的残酷杀害使德法奇太太从小就对贵族阶级怀有不可磨灭的仇恨。在暴乱发生时,德法奇太太毫不犹豫地将对敌阶级的头砍下。为了满足她复仇的欲望,她不分善恶,甚至要伤害包括达奈在内的所有贵族阶级,还意欲杀害露西和曼内特医生。此时的德法奇太太性格已经在仇恨之火中扭曲。

作为一名受压迫者,德法奇太太同情受压迫者,并联合他们一起反抗贵族阶级的压迫。尽管她铭记她家人悲惨的命运,仇恨也根植于她内心深处,她对底层阶级的人民的态度很友好。比如,她为一个底层阶级家的孩子惨死在侯爵的马车车轮下的景象感到难过;她为马奈特医生不公正的囚禁感到愤怒和同情。当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地穿过大街”并轧死一个孩子,侯爵不但没有担心孩子的生死,反而担心他的马是否受伤时,德法奇太太对贵族阶级的仇恨和她对底层阶级人民的同情达到了极致。“他扔出一个金币”以补偿被轧死孩子的父亲。见到这一幕,德法奇太太勇敢地将金币扔回了马车,以此来作为一种反抗。当德法奇为革命进程的缓慢而感到灰心丧气时,德法奇太太的耐心和远见使德法奇自愧不如而附和了她的决心。她清楚地明白“仇恨和报应需要时间;这是规则…… 尽管革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革命即将到来……

革命热情不会消退,也不会停止……革命的步伐总是在前进…… 我一心相信,我们将看到革命的胜利。”^[3] 听到这些,德法奇“像个在老师面前温顺而专心的小学生,微微低头在她面前,”^[3]同时大声夸赞道:“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一个强悍的女人,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非常伟大的女人!”^[3]因此,在革命爆发前,狄更斯欣赏德法奇太太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个性,过人的智慧以及非凡的领导和组织的能力。

随着革命进程加快,德法奇太太变得越来越残忍和恶毒。“释放一只老虎和一个恶魔。”^[2]她叫嚷道,而当她 will 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藏在胸前,一柄锋利的匕首藏于腰间准备复仇的时候,老虎和恶魔正是她的化身了。德法奇作为领导者的角色很快被德法奇太太取代,她一言不发而警惕地编织物此时变为了恐怖的中心载体。

德法奇太太不再是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被渗透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公正感和对一个阶级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的女人,一旦机遇来临,她就变为了一只母老虎。她已没有了任何怜悯之情。”^[3]比如,在谋杀巴士底狱的总督 De Launay 的事件中,狄更斯将德法奇太太描述为一个冷血和恶毒的魔鬼。在对德法奇太太后来的描写中,狄更斯甚至控诉她如此“疯狂的行为”。狄更斯认为她残忍野蛮,她的行为违背了道德准则。在 1789 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远在安托内,一阵喧闹从一群人中涌起,赤裸的手臂像冬天寒风中的树干一样挥舞着。每个人都手握武器:手枪、树干、铁棒、刀子、斧头以及其他任何可以用来当作武器的东西。而当时,德法奇太太正走在许多女人的前面,她呼喊道:“这个地方被占领后我们就可以杀死他们了。”^[4]德法奇太太成为了一个无情的复仇者,她的心肠在饱受苦难火焰的煎熬中变得无比坚硬,不带一点同情心。

3 德法奇太太作为受压迫者和压迫者

18 世纪的法国,女性虽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女性地位极低。科林·琼斯在阐述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性地位时,详细探讨了当时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雅各宾派把女性俱乐部视为左翼组织,主张女性应该留在家中培养有教养的爱国者。拿破仑认可这一观点,并在《法典》中将女性归于次要地位。”^[5] 1789 年的《人权宣言》表面标榜着人人平等,但在现实中女性权利却被排除在男性权利之外,所谓的人人平等只限于男性,法律政治和经济知识男人的领域,与女人无关,女人只限于性贞洁,服从和抚育子女的私人领域。18 世纪末制定的为遭到殴打、遗弃的妇女改善法律地位的自由离婚法,以对女性不利的方式加以修订。

德法奇太太作为一名当时底层阶级的女性,受到双重压迫。一方面,德法奇太太出生于社会地位最底层的佃户人家,另一方面,德法奇太太生活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期,因此,她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压迫。一个人所受的

压迫越大,他的逆反心理就会更强烈,反叛手段也会更为残忍;并且革命推翻压迫阶级以后,新的统治阶级同样会采取不公正的手段对待被压迫者——被压迫者变为了压迫者。德法奇太太作为一名受到双重压迫的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以及内心对贵族阶级的仇恨使她走上复仇之路。当革命爆发,她变为了一个野蛮的禽兽,不惜一切走上复仇之路。她残忍到甚至意欲谋杀无辜的露西。从这一方面看,德法奇太太成为了她手下受害者的压迫者。

德法奇太太出生于一个佃户人家,她的姐姐被玷污,家人遭到迫害;她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她的父亲、哥哥、姐姐以及姐夫。她的姐姐被强奸后被折磨致死,她的哥哥被埃德蒙兄弟中的弟弟杀害。不幸的童年使德法奇太太精神上遭受巨大创伤。她出生在社会等级中的最底层,她的家人是受到贵族阶级压迫的普通民众。她对埃德蒙兄弟有着不可调解的仇恨,因此,她决心为她家人报仇。

无辜的人比如曼内特医生和露西差点成为她残暴行动下的受害者。当德法奇太太前往曼内特的住所,意欲杀害露西和她的女儿时,狄更斯通过多次重复“静静地,德法奇太太沿着街道,越来越靠近”^[3]的措辞,渲染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以此来暗示德法奇太太已然成为一台机器,一心只想为她姐姐的悲惨遭遇报仇雪恨。这种恐怖气氛的描述为读者对于后来德法奇太太对曼内特、露西和露西的孩子的仇恨预先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德法奇对曼内特家庭表现出仁慈之心,想要把露西和曼内特医生从特雷泽定罪中拯救出来时,德法奇太太仍然顽固地决心杀害曼内特医生和露西,此时的德法奇太太已然成了一个禽兽般的角色。德法奇太太不能将达奈和他侯爵叔叔两类人区分开来,正如侯爵不能将底层阶级的人看作是有自身价值的个体区分开来一样。他们都仅仅以阶级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只是机械地将周围的人归结为不同的阶级。最后,德法奇太太成为了一名迫害无辜者的压迫者。作为一名出生于社会底层阶级的女性,德法奇太太由一名受压迫者向压迫者身份的转换正是由于双重压迫的结果。

4 德法奇太太作为受害者和加害人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伦理学认为,人是一个能够感受外物作用的有机体,趋乐避苦和自爱利己是人的永恒本性,人的所有欲望、感情和精神都来自自爱心。爱尔维修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认为利益是判断道德的标准,利益不仅决定人的道德观念,也决定人对道德行为的评价。他断言:“无论在道德上或认识问题上,都只是利益宰制着我们的一切判断。个人利益决定着个人的道德判断,社会利益决定着社会的道德判断。”^[6]他认为人的本性谈不上善恶,它是后天的产物,是由于环境和教育的结果。“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6]他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或“人的观念是

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命题。

根据爱尔维修利己本性的观点,不论是作为受害者时领导受压迫民众起义反抗的德法奇太太,还是作为加害人时无情杀害无辜敌对阶级的德法奇太太,都是由于人趋乐避苦和自爱利己的本性所致。作为社会的底层阶级,德法奇太太的家人受到贵族阶级的残酷迫害。因此,德法奇太太领导受压迫的底层人民奋起反抗,成为革命阶级。然而,她错误地将所有贵族阶级归为敌人,不加区分地视整个贵族阶级为敌对方。她甚至意欲杀害无辜者达奈。暴乱发生时,她变成了一头嗜血的野兽,领导妇女们反抗统治阶级,毫不留情且不加区分地将贵族阶级的头砍下。不论是同情贫苦民众的“善”的德法奇太太,还是残忍复仇的“恶”的德法奇太太,都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

德法奇太太是埃德蒙兄弟罪恶事件的受害者。她的家人受到埃德蒙兄弟的迫害。仇恨深深地根植于她内心,在她成长过程中,她不惜一切地想要复仇,即便她的复仇行动过于极端,并且她的复仇行动意味着给像达奈、马奈特医生和露西这样无辜的人带来伤害。因此,当暴乱发生,德法奇太太复仇的机会来临时,她甚至意欲杀害马奈特医生和露西。此时她由一个受害者变为了一个加害者。

作为一个埃德蒙兄弟罪行的受害者,德法奇太太从小就对贵族阶级怀有极大的仇恨。对贵族阶级强烈的仇恨一直伴随着她,这种仇恨渗透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不知疲倦地将她意图复仇的目标人物的名字编织在她无时无刻不在编织的编织物里。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记录贵族阶级的罪恶:“她以她自己独特的针法和符号编织着,这些符号对她来说再清楚不过了……相比消除德法奇太太编织的标记名字上的一个字母,一个活在世上最懦弱的胆小鬼结束自己的生命要容易得多。”^[3]

在某种程度上,尽管编织在记录贵族阶级的罪行上是很好的方式,但是德法奇太太却因此变成了一个机器般的人物,一心只想报仇雪恨。她心中饱含仇恨,一心将复仇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因此她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在德法奇太太成长为一个成年人的过程中,她的家庭悲剧对她个性的形成与塑造有很大影响。在小说的最后章节中,虽然德法奇太太在斩首她的敌人中获得乐趣,虽然她复仇的欲望得到满足,她仍然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因为她性格的悲剧是当时时代环境的产物。

由于德法奇太太不幸的童年遭遇,当她长大,她的个性体现了革命的性质;暴力和仇恨交织,在她心中沸腾,她等待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算她的行为意味着给无辜者带来灾难,她一心想要革命的真正目的是报复达奈。“决不!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谢天谢地我可以来这儿阻止你——我会阻止你!”^[3]德法奇太太说,“畜生,别挡我的路,否则我会将你碎尸万段。”^[3]一步步地,德法奇太太转换成了另一重身份,即,一个加

害人。

小说通过对于洛内,弗隆和后来弗隆女婿可怕而又生动的惨死以及德法奇太太对此幸灾乐祸场面的描写,革命暴力和恐怖的一面进一步突显。在描述一群人追踪洛内的脚步的情景时,狄更斯将德法奇太太刻画为冷酷无情的形象,她与他保持着“固定的近距离”(狄更斯重复了五次这个短语),以便当洛内被打倒时她可以第一个砍下他的头颅。当群众们抓捕住监狱长,并押着他进行判决时,德法奇太太走在这位失意的监狱长旁边。当监狱长被人从后面突袭,倒地而死时,德法奇太太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并毫不犹豫地砍下了他的脑袋。从德法奇太太毫不留情地砍下监狱长脑袋这一行为可以看出,德法奇太太变为了一个残忍恶毒,冷酷无情,心胸狭隘的加害人。因此,德法奇太太作为受害者和加害人的双重身份正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

5 结 语

国内外对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做过大量研究,评论家们对于德法奇太太的形象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通过实例分析,揭示了德法奇太太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她不能被简单地贴上好或恶的标签。她有双重身份:她既是一个勇敢的女英雄,又是一个恶毒的复仇者;她既是一个被压迫者又是一个复仇者;她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加害人。

德法奇太太身份的逐步转变是随着革命推进和社会条件演化的结果。尽管在小说的前部分,德法奇太太同情被压迫者,并且她被刻画为一个勇敢的女英雄,她也不能被简单地贴标签为一个仁慈的女人。同样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德法奇太太被刻画为一个一心只想满足她复仇欲望的禽兽般的女人,她也不能被简单地贴标签为一个恶毒的女人。

卡尔·马克思称,“人类道德,文化和宗教价值观不是由任何与生俱来的善恶观念引起的,而是在一个特定系统的需求下形成的。”^[7]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缺陷,而是腐朽社会的产物。此外,社会对

个人性格的形成有塑造性影响。德法奇太太的性格特征,不论好的特质还是恶的特质,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她个人的意志。不管是作为一个勇敢的女英雄还是作为一个恶毒的复仇者,不管是作为一个被压迫者还是一个压迫者,不管是作为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加害人,德法奇太太的身份和个性都受制于她所在的社会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像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一样,德法奇太太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她既不是绝对的善,也不是绝对的恶。

作者狄更斯也注意到,德法奇太太的恶并不是她与生俱来的缺陷,这种恶是由于贵族阶级的压迫和她所遭遇到的个人悲剧造成的。正像贵族阶级的压迫使德法奇太太成为了一个被压迫者一样,德法奇太太的压迫也使她成为了她手下受害者的压迫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应承认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狄更斯对于德法奇太太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当狄更斯对德法奇太太做出评价时,他仅仅将眼光集中在社会道德和人道主义层面上,他并没有关心其他方面比如社会大背景对德法奇太太性格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高广孚. 杜威教育思想[M]. 密歇根: 水牛图书, 1976.
- [2] Dewey, John.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2.
- [3] (英)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M]. 王 勋, 纪 飞,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 2009.
- [4] 何 畏. 从《双城记》看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 [5] 科林·琼斯. 剑桥插图法国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 [7] Wood, W. Allen. Karl Marx [M]. London: Routledge, 2012.

(责任校对 王小飞)